

ZHONGGUO

ZHONGGUO GUANGBODIAN SHI CHU BAN SHE

中国电视 论纲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电视论纲 ■ 中国电视论纲 ■ 中国电视论纲

杨伟光
主编

中国

LUNGGANG

DIANSHI LUNGGANG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电视论纲

杨伟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电视论纲/杨伟光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8

ISBN 7-5043-3184-8

I. 中… II. 中… III. 电视工作-理论 IV. G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761 号

中国电视论纲

主 编:	杨伟光
责任编辑:	王敬松 金文雄
特邀编辑:	杨良志
装帧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涿州市先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00 (千) 字
印 张:	17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15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184-8/G·1202
定 价:	35.00 元 (精、平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
课题组组成人员

组 长：杨伟光

主研人员

杨伟光 章壮沂 罗 明 王 录 王 甫
欧阳宏生 王 锋 张君昌 时统宇 尹 鸿
童 宁 郭镇之 韩 泽 胡智锋 刘建鸣
张群力 尹桂馥

内 容 提 要

《中国电视论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电视实际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电视的基本特色。在考察中国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明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电视事业的性质、任务和功能，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节目、技术、经营和管理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述了中国电视观众、从业人员素质、理论建设同发展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密切关系，描绘了 21 世纪中国电视发展的目标，说明了加强中国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对实现总体目标的重要性。

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著作，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特点，有较高理论层次和较强的指导作用。

序 言

杨伟光

当《中国电视论纲》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的时候，离中央电视台成立 40 周年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夜深人静审读这部书稿之时，便想起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的确，在香港百年回归、长江三峡大江截流、伊拉克武器核查事件等电视现场直播报道中，中国电视站在世界重大事件的报道现场，在信息传播中显示了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相应的风范和地位。然而，这仅仅是表明了中国电视传播实践的进步，中国电视理论思维的进步则是另一项浩繁的工程。在中国电视事业巨大发展的背后，该有一种怎样强大的理论力量作为它的支柱和灵魂呢？如今，当这部凝聚着电视工作者理论建树和实践总结的著述即将付印时，我不禁在思量：我们究竟是已经站在了科学的高峰，还是只是开始了对这一高峰的攀登？我衷心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改变中国电视传播实践突飞猛进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467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第 1 版。

题方面，能做出应有的贡献。让我们在电视精品迭出的同时，能有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电视理论之作，以便推动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电视事业登上新的高峰。



《中国电视论纲》的创意策划是从 1995 年开始的，当时，我们把这一课题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在课题组成立的会议上，我作了个发言，题目是《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研究》。这以后，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召开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证会上，我和专家们一起研讨。我们之所以下决心并准备花大气力把这个课题做好，或者说这一课题从最初的立意到认识的不断深化，有两种考虑：

一是中国电视走过了 40 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所经历的一切，既不全是坦途，也不都是曲折，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实践中获得的，是我们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当代电视工作者有责任、有必要、有能力认真总结这 40 年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其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完成这一任务是责无旁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是要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这是一个在较高层面上的深入思考，它有助于我们摆脱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二是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电视事业正处在一个新起点上，这个新起点的标志不仅是世纪之交的时间概念，而且是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电视如何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而不丧失机遇？怎样开拓进取而不因

循守旧？我们应当坚守的理论起点和实践归宿何在？中国电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迎接下一世纪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都是必须回答的。我们的视野和努力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既要“继往”，更要“开来”。如果说，今天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原有的电视理论所无法预测和解释的，那么，这部书应当以自己特有的、富有前瞻性的理论预见，在21世纪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中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这世纪之交，我们研究的视野还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写这部书，是缘于：对中国电视理论发展的现状不满足，对电视理论远远滞后于电视传播实践的“落差”不满足，对轻视理论的短视与浅薄不满足。一切创造都是历史的延续，一切创造又都是从不满足开始。我们决心在发挥系统优势的同时，集中全国致力于电视理论研究的精兵强将，下大功夫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的研究。

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始终把握了这样一条基本理论线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事实雄辩地证明，鲜活的理论与具体的事业结合恰当而紧密时，往往能对这项事业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使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在当代社会，理论对具体事业的指导作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这些年来我们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根本指导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方针，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设成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的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尽管小平同志对电视宣传工作的直接论述和指示并不很多，但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关于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都对宣传电视事业有着深远而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目前这个中国电视事业正当大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理论对其发展战略、节目生产、改革方向和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都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

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统领全书的指导思想，我们对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也就有了基本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电视事业不断发展和持续繁荣的根本所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同为大众传媒，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尽管也曾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但也其他新闻媒介相比，由于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前普及的程度还很低，因而历史的负担并不很重。这更有利于突破与创新，更有利于成长与发展，更有利于接近新闻战线解放思想的本质——传播政府的法律、社会公德，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信息和文化需求。因此，对于束缚电视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对于处于探索阶段的东西，我们判定其是与非的重要根据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在《中国电视论纲》中，我们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是否有利于电视事业的发展壮大，是否有利于提高节目的质量、满足群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是否有利于调动电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始终不忘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践的尊重。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邓小

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提出了有两部“宣言书”：一是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前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后者“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①。这两个宣言书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个宣言书是中国电视在80年代拨乱反正，使电视飞速发展成为重要传媒的政治保证；第二个宣言书则为中国电视在90年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进而走向世界扫清了思想障碍。

以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为代表的中国电视改革，在90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1993年《东方时空》的开办为标志，我们尝试着抓一些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结果受到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欢迎。第二个阶段，自1994年起，我们开办了《焦点访谈》，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安排在黄金时段里面播出，力争作比较有分析深度的报道，引起了领导和群众的关注。第三个阶段，即两年以后，我们开始做《新闻调查》（因为《焦点访谈》毕竟只有13分钟，要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解剖和分析就比较困难），现在看来《新闻调查》已经站住了，这个节目可以与世界的一些大的电视台名牌节目相比，这是难度较大的节目。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马克思曾经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①如果说，20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划破中国苍穹的思想闪电，那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2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化、充满发展活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每上一个新台阶，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真理是朴素的，弄通了一个道理，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中国电视事业发展需要的首要条件不是技术和设备，而是需要勇气——包括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一代又一代中国电视人都应当牢记：真理无穷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止境，失去了开拓的勇气和科学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恰逢其时，《中国电视论纲》策划、研讨、写作的三年时间，也正是中国电视事业高速发展的三年。尤其是1997年，被誉为中国电视的“现场直播年”。以重大新闻的电视直播为标志，中国电视传播越发显得大气磅礴、波澜壮阔。通过电视传播实现的那些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写作本书的专家学者。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一原则已成为他们的行动自觉。可以说，这部书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原则，来探索中国电视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有益尝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二

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我们对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要求：“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① 这些由中国电视事业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不能动摇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健全的法制的社会，喉舌的性质从根本上讲是与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相一致的。我们认为，中国电视必须在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工作。坚持喉舌的性质，就必须坚持法治而不是人治，就必须宣传贯彻国家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这不仅是理论认识上的深化，而且是电视实践发展的必然。比如，《焦点访谈》中许多舆论监督的事例之所以搞得很好，原因就在于这种监督所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而不仅仅是一种义愤，也不仅仅是电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就是要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高度去理解“喉舌”，认识“喉舌”，充分发挥喉舌的正常功能。

在《中国电视论纲》中，我们结合新时期的时代特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电视工作的党性原则。我们认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时党性原则的最高体现。电视对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必须旗帜鲜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明，这是中国电视工作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

我们党的惟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电视要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必须全面、准确、迅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连，始终扎根于当代实践。这是真正坚持电视工作的党性原则的重要内容。

从当代人民群众的实践角度去阐述党性原则的意义何在呢？从电视传播的成功实践来看，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个长期困扰新闻界的老问题，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的一致性问题，就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问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声音，这也是党的喉舌的重要表现。传播党的声音和传播人民群众的声音高度的统一才是党性的生动体现。以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栏目为例，经过反复的摸索，这个栏目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而改变了原来居高临下的与老百姓距离较远的状况。由于这个栏目内容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因此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人民是电视的主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通过电视手段及时、形象、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的要求。电视传播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营养。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中国电视节目中一系列深度报道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匡正着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这些报道

在中国电视传播中居主流地位的秘诀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是电视传播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电视论纲》中，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电视舆论监督的成功实例，分析和论述了电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中，舆论监督有过比较活跃和成功的时期，也有过比较沉闷、缩手缩脚的时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观察与思考》曾经过的三起三落。

“东方风来满眼春”，让中国电视在舆论监督中大显身手的关键原因在于邓小平同志 1992 年的南方谈话。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小平同志那句至理名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于是，《时空报道》（原名为《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先后推出。结果怎样呢？1997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考察中央电视台时，来到《焦点访谈》节目组，他笑着说，我每天看《焦点访谈》：他欣然提笔写下几个大字：“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同一天，李鹏在接受《中国新闻》英文月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对电视舆论监督的赞赏。现在，电视舆论监督的威力和魅力有目共睹，影响越来越大。

为什么电视舆论监督会有如此长足的进步呢？从客观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374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讲，中国社会承受力的大大增强，是电视舆论监督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基础。这种承受力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既是领导的，又是群众的；既是被监督部门的，又是全社会的。社会承受力并非是什么观念理解力或理论思辨力，它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反应。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和综合国力贫弱的国度，舆论监督的社会承受力是比较低的。中国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就是舆论监督得以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一个身心健康、体貌端庄的人是不怕别人品头论足的；一个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国家是经得起外界说三道四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社会主义的中国“仓廩实”，我们的人民“衣食足”，这就是最坚实的社会承受力，这就是电视舆论监督最牢固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在走向成熟，光明的中国为舆论监督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从主观原因来说，电视工作者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正确认识 and 准确把握，是电视舆论监督的成功实践的主要保证。现在许多电视工作者都认识到，找到了政府和老百姓的信息沟通渠道，说明我们对电视舆论监督的度把握得比较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政府和老百姓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把老百姓的意见和政府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是新闻媒介应该做而且完全做得到的事情。事实上，电视舆论监督的成功实例中所反映出来的电视工作者的智慧、勇气、成熟、敬业精神和创造活力，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敬重与推赏。

电视新闻传播中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在书中也作了角度不同的阐述。反映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揭露一些干部的胡作非为，过去有少数人认为是暴露阴暗面。“生活是这样的吗？”

“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曾经有些人一提新闻批评就出现的这类道貌岸然的诘问，如今已经普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病态。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不会因为电视曝光了某条河流被严重污染就认为自己家里的自来水也有毒了，不会因为电视报道了某个地方的粮食因阴雨连绵无法收晒就怀疑要发生饥荒了，不会因为电视里反映了一些行业的乱收费就认为这些行业全烂掉了。一句话，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在你身边，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的变化中，在与20年前的对比中，在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中，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前途与希望，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句老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邓小平同志那睿智的声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①这才是本质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当中国电视新闻愈来愈接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个朴素的道理，愈来愈将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视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愈来愈表现出坚持喉舌性质和党性原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这种真实性的原则也就愈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国电视论纲》这部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学术理论界对世界范围内的电视负面影响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理论来源有国外的大众传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等。从积极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说，这些理论研究无疑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任何工具把握得不好，都可能产生异化现象，所以，电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但是，中国电视理论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传播的实践，我们的电视理论和实践，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只要我们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以文明健康的节目奉献给人民，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我们坚信中国电视理论与中国电视其他产品一样，它们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在于：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越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越具有世界性。

对于事关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全局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也没有回避，而是知难而进，提出我们的看法。比如四级办电视问题，《中国电视论纲》着重从体制管理和发展战略两个方面，分别作了分析。我们认为，四级电视台并存是现阶段中国电视事业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四级办电视对于推动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实际上，这其中并无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这里仍然需要回归常识，这就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家只有一台电视机，只能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看。我们的明智选择在于多出精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不需要无谓地投资。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应当以中央电视台和省台为主，基层电视台应以转播为主。这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基本道理决定的。

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惟一的国家电视台，应当首先担当起建立中国电视发展新模式、引导中国电视发展方向的重任。国家电视台的视野应当开阔而非狭隘，事业应当开放而非封闭，目标应当长远而非短浅，管理应当有序而非混乱，节目应当高精丰富而非低俗单一。而要做到这些，首要的就是要确立科学可行的发展战略。《中国电视论纲》对中国电视在下一个世纪